

关于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时间观的再认识

何 颖

(电子科技大学 外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54)

摘要:福克纳通过《喧哗与骚动》的创作展示了其独特的时间意识与时间哲学。其小说从章节题名到人物意识无不是福克纳独特时间观的具象性表现。福克纳的时间观是二相时间观——过去与现在,而非常识的三位时间观,即过去—现在—未来;在时间与空间之关系上,则体现为空间上的暂时悬搁与此时的跌落;在人物行动上则是无限期的延异与沉潜于既往;在事相呈象上则是以实为虚、化实为虚。

关键词: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时间;空间;时间呈现意象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5)03-0079-06

一 引言

美国 20 世纪杰出小说家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不仅因其淡出传统小说的美学表现技巧,潜沉于人物流动着的内心世界,而被视为“纯意识流小说”,从而跻身于以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伍尔芙的《到灯塔去》等为代表的欧洲现代经典之列,更因小说中所体现的独特的时间意识与时间呈现意象(presence of temporal image)而倍受评论家关注。本文拟在研读《喧哗与骚动》及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解读。

福克纳的时间观是二相时间观——过去与现在,而非常识的三位时间观过去—现在—未来;在时间与空间之关系上,则体现为空间上的暂时悬搁与此时的跌落;在人物行动上则是无限期的延异与沉潜于既往;在事相呈象上则是以实为虚、化实为虚。其效果必然是“现在”只具有功能性,空间因行动的延宕而收缩,停止了脚步的“现在”无法在空间中舒展与稀释,从而使此时中的人物不能不承担大于自

身并先于自身的“既往”,于是记忆与忘却、放弃与留恋,成为作品中的两大支柱。在这种张力中所产生的结构、意义乃至姿态就不能不暗藏一种即将到来的崩溃——复制一个完整的过去的历史意识与再度体验过去的历史意识之间的矛盾,一个被过去所填满的现在与一个反思/参与过去的现在之间的矛盾。如果被埋葬的历史注定只有现在才能说出,而“现在”这个反思者却既已丧失自身,那么“现在”的担待者就注定要接受无穷的混乱,并最终在沉沦中毁灭自己。

二 过去与现在的二相时间观

《喧哗与骚动》在人物上以南方贵族康普生一家的后代为中心,在活动空间上以约克纳帕塔法为中心,在述事角度上以“我”的感知情绪(或意识世界)为中心。叙述者既是提供事件的人,亦是事件的体验者。这种在异位时空下的对“过去”事件的体验,因叙述者为过去的事件所充满,此在“现在”的在场性时时受到了威胁与钳制。叙事者对过去事件的体

收稿日期:2004-11-17

作者简介:何颖(1967—),女,四川南充人,电子科技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英语文学硕士。研究方向:英语文学,翻译研究。

验则因体验者的异位以及叙事者与体验者身份之重叠而变得模糊与诡怪。当既往事件的回忆者本人淡出了“现在”，那他也就失去了将既往作为对象进行反思的能力。取消现在虽有利于取得与既往的同一性体验，但由于体验性参与过去的“化虚为实”之行动诉求与淡出现在之“化实为虚”的心理诉求之间的冲突，从而使同一性体验变成了对虚无的体验。

《喧哗与骚动》中的人物是一个个虚无的化身。这种化身不是人物被动地获得的，而是人物主动地为自己营运构造存在意义的结果。当回忆既往与当下体验既往构成同一性时，这种重建既往意义的诉求无疑具有主动性，但由于当下“现在”在体验性参与过去时削弱、甚至零度化了自己的现在，现在则化为虚无；而因体验者的虚拟在场性、异位以及丧失作为反思性介入的现在，过去则跌落于毫无载体性的虚无之中。这种毫无载体性的虚无却要承担起“对大于自身并先于自身的一种秩序的承认”[1](888页)，结果是作为叙事者的“我”在他“所依赖的整个过去和一秒一秒不断进逼着现在的过去”[1](887页)中拼接组合着自己，从而导致了过去与现在之间既无理性轨迹可寻却又暗示出杂乱无章的同时性。

《喧哗与骚动》中主要(和许多次要的)人物身后总是拖着许多家族的、区域的限制成分：祖父母、父母、兄弟或姊妹，山乡或谷地或潮水，这一切人物事物聚会起来就在于构成不可少的具有同一性的背景。这种同一性的背景无疑可以称之为保罗·德·曼所谓现代派的“故意的忘却”——“想拭掉过去发生的事，希望最终到达那能被叫住真正现在的那一点”[1](889页)。然而，“故意的忘却”却意味着与持续进逼着的过去的斗争。同样，约克纳帕塔法县的灵感世界却拒绝忘却任何事物。它的人物和它的虚构的情境都沉浸于缅怀往事之中，无论是对于人物之生活，还是对于作者之写作，都不过是对于过去的重复。

班吉自身是一个永恒的现在——即其现实性的视觉、触觉与嗅觉构成其意识活动的全部。在班吉的意识中，现在时间与过去时间之间缺乏明确的界限，而现在时间视域中的诸多感觉，因其诱导着一种更为持久的“既往”的事件，而变得短暂、及时而不可捕捉。因此可以说，班吉的“现在”是一种被剥夺了存在的“现在”。由于其“现在”在被剥夺时参与了

“既往”事件之中，也因此可以认为，班吉在丧失其现在的存在之同时，却维护了其自身存在的零度社会角色，其存在具有浑圆性、整体性与虚无性。在小说中，相对于“失去了自己与生俱来的一切权利”[2](335页)的康普生家族以及其他家族成员来说——如那个“犹如一个期待恋人般期待着死亡的”昆丁最终投河自杀[2](323页)，那个等待着自己从未继承过的一笔遗产、并注定成为康普生家族最后一人的光棍杰生，以及那个在他人回忆中“注定是家庭自尊心的脆弱而必将破碎的容器”[2](325页)的凯蒂，班吉却始终保持着其完整性，正如福克纳在小说《附录：康普生家谱》所说：他爱三样东西——牧场、火光以及他的姐姐。“这三样东西他都没有失去。”“1933年，被送进杰克逊的州立精神病院。即使这时候，他仍然什么也没有失去。”[2](334页)

凯蒂在《喧哗与骚动》中一个永恒的未来式存在，是小说中绝对“非在场性”的人物——如，她的童年生活，她对其弟白痴班吉的关爱，以及她的被诱奸与被迫出嫁，继而被弃，终于离家出走，以及她的“失去贞操”给家族荣誉的打击等等，都是在班吉、昆丁与杰生等人的回忆中连缀起来的。但她的“非在场性”或者在现在时间中隐遁，不仅构成康普生家族“失去”的整体意象性载体，也构成小说在一种大胆的、不连贯性的叙述形式中让其“在场”人物体验到时间流逝、一去不复返、以及曾经“有”而现在“无”的凋零、破败、令人迷惘的整体气氛。凯蒂在这种整体气氛中不仅成为连接既往与现在的媒介，也成为小说中人物意识着的对象，她像雾与空气般笼罩着人物的情绪与意识。可以说，她在现在时间中的遁逸，反而使她成为“我”(班吉、昆丁与杰生)参与既往体验的参考原型。她在“现在”时间中的遁逸性，反倒使她能真正摆脱过去对她的挤压，摆脱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冲突，她“既不主动迎接，也不回避”[2](325页)地进出于“现在”人物的意念之中，从而完成了自我形象的塑型——在班吉嗅觉中她是“树的香味”，在昆丁意念中她是“失贞”以及被欲望着的对象，还是纳粹将军的情人，在小昆丁眼里，她是“母爱”的体现，对康普生家族来讲，她是家族的毁誉者。

如果说凯蒂因其非在场性而成为班吉与昆丁记忆的对象，同时因其非在场性，她也就不再是事件的体验者了，那么昆丁则融事件叙事者与体验者为一体。其“我”在小说中沉湎于往事之中——班吉的哭

闹、凯蒂的失贞与情人、家族的荣誉等等。“我”生活在回忆之中，回忆变成了生活自身，生活由一系列过去的幻觉构成——过去的事件与当下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感官重叠起来，这样，过去像雪球般涌入他的“现在”时刻。由于现在为过去所填满，叙事者无法将回忆与再度体验过去的历史意识区分开来，叙述者既不能解释过去，亦不能意识到过去对于自己的真正意义。此时这位过去的担待者也最终隐遁在虚无之中，因为无“此在”之我既没有成为过去的对象也无法让过去成为“我”的对象，而以无己之我感受过去，过去也会与“此在”之我一起化为虚无，其结果只能是寂寞与死亡：“我过去不是。我现在是。我过去是。我现在不是。”[2](179页)

《喧哗与骚动》中昆丁要想在想象中重新体验与占有他以前的历史/时间，体验者此时的现在与过去的矛盾和冲突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反应形成了意识的顶点，也同时把“现在”淹没在来自过去不同的声音、模糊的人物活动、摇曳不定的物象整合之中，而现在与过去则因各自在场性与非在场性之间的张力而造成叙述形式上的压力——过去挤压着现在，欲望挤压着语词，记忆的叠加碾过一个个遭受体验的、永不终止的句子。在这种连绵的流动中，并非是时间的延续(过去—现在—未来)，而是时间的中断(suspension)、悬搁。“现在”在过去的挤压之下不仅丧失了对未来的选择，更使自身成为一个逝去的、遥远的过去起点，并循环地终止于自身，而自身的感觉(味觉、嗅觉、触觉、听觉)引领着重新回到过去的追思与记忆之间。正如昆丁的父亲对他所说：“我把表给你，不是要你记住时间，而是让你偶尔可以忘却时间，不是把心力全部用在征服时间上面。因为时间反正是征服不了的。”[2](85页)既然时间是征服不了的，而“现在”和“未来”又是模糊的，不可捉摸的，那么，对于昆丁来说，摆脱“现在”煎熬的唯一办法，也就只剩下了从现实世界中永远消失。昆丁死了，时间对于他，也就永远也不存在了。

由此，萨特在分析《喧哗与骚动》中的时间意识时指出：福克纳“给时间斩首，去掉了时间的未来——也就是自由选择，自由行动的那一面”[3](164页)。如果说“给时间斩首”，是福克纳叙述技巧上的自觉选择，旨在追求叙述方法上的多样化，强调时间的非客观性，突破传统小说叙述受时间线性维度的限制，从而在小说时间设置上显示出模糊化、无

中心、混合和反讽等特点。那么其深层的原因则源于作者对传统/现在/未来之间彼此矛盾和冲突所出现的“非线性”、“非连续性”的断裂感。这种自觉的叙述追求和深刻的现实感，凝结于时间这个在小说中具有主人公地位的“无处不在”触媒身上，则铸成了一种时间哲学观的历史深度——即“真正的时间，构成我们生活中戏剧性内容的时间，是比手表、时钟和年历更为深刻、更为基本的东西。时间是稠密的介质，福克纳笔下的人物在其中活动，就象拖着双脚在水中行走。时间是他们的实质或本质”[4](53页)。

这种时间的“实质”或“本质”，对于福克纳的人物而言，无疑更具有存在上的必然性。对于他们，时间变成了一个更为无情、更为绝对的现实——“时间在不间断地、永恒地、越来越来有气无力地行进”[4](85页)。然而，“暂时性、瞬间性却成为他们永远无法脱逃的视野，就象永恒是中世纪人视野中的界限一样”[4](53页)。一个没有未来的现在，也就必然让人物在空间上遁逸。同时，过去却决定着现在，消解着现在，消解了现在的过去在自身消耗着自己的同时进入虚无，人物亦最终在“失贞”、呓语与死亡中寂灭着自己的生命。可见，福克纳的二相时间观不仅决定了小说叙述的方式，亦决定了小说中人物最终的命运与结局。

三 时间/空间重叠与时间化的空间

历来关注《喧哗与骚动》中的时间性，但却忽视了空间性。只注意过去与现在，而忽视了现在与空间之间的关系，也在根本上否定了叙述文学的“呈象功能”，而这种“呈象功能”应该成为文学之本质特征。正如美国文学家弗兰克在第一次将“空间感觉”的概念引入现代小说分析时所说：“我们已经证明在每一个感觉的范围内，体验在一开始时就采取了空间形式。”[5](75页)重视意识与体验之意象性表现的文学作品更是需要在空间上为自己获得物象形式，这也就是文学之所以是感性的、具象的根源之一。福克纳让人物过去决定、并消解着现在，但现在并不因此而死去，这是因为现在是叙述所要求的，它要为过去——记忆、叙述者流动的意识、幻想等——提供物象。而物象是叙事者的此在性空间构成条件。提出了“心理时间”的柏格森在肯定“直觉”是“真正的时间”的同时，指出：“如果时间没有超越它自身的参照，我们就不能感知现在——我们仅仅可

以感知过去和现在的交叉作用。”[5](89页)可见,时间“自身的参照”就是“现在”意识或体验借助于物象在空间上的延伸。在福克纳那里,过去与现在的交叉作用,使现在为过去所填满,从而失去“自由行动”与选择未来的可能性,那么意识着的“现在”也就无法借助空间视域在较宽阔的幅度上为时间(过去)提供事相,从而也就让人物失去了在其中展现自我决定、并抑止过去以便在空间得以伸展的可能性。福克纳小说中所营造的孤寂、静止、颓败、死亡的气氛,正是作者这种独特时空意识的体现。这一时空意识不但是人物处境的逼真反映,而且也强化了人物命运的必然性。

海德格尔在讨论时空关系时指出:此在既是空间性的也是时间性的,即“此在式空间性的时间性”[6](432页)。而“此在”之呈象或表象是“以取得空间为前提的”。按照海德格尔的解释,“此在的取得空间包含有某种揭示活动,即通过为自己定向而解释场所这样的东西。”[6](434页)过去、现在只有当前化,只有在境域之中才能成为自身,而要当前化,就必然要“以取得空间为前提”。对此,他指出:

世界不能现成存在在空间中;空间却只有在一个世界中才得以揭示。恰恰是此在式空间性的绽出时间性使我们可以理解空间不依赖于时间,但反过来却也可以使我们理解此在“依赖”于空间。这种“依赖性”在下述众所周知的现象中公开出来:此在的自身解释与一般的语言含义内容广泛地由“空间表象”统治着。[6](435页)

在《喧哗与骚动》中,人物沉湎于过去并承受着过去的挤压,从而使现在隐遁,但是过去要现形却必须取得自身的“表象”,即过去要在现在以及现在的空间里赋形。同时“我”无论对既往如何牵挂也终将“沉沦”或“失落”于当前化之中。

小说中人物如昆丁虽然在讲述和体验过去,但其本人却不能不存在于此时此景之中。“我”似乎在两股同样大小的潮流之间,任由既往与眼前事相的摆布。“我”挣扎着摆脱时间与空间的桎梏,但“我”却每一分钟都处在证实与否定、破坏与完成的夹缝之中而不能自拔。当“我”似乎在体验着一种“真正的现在”时,却因既往的突然莅临而使此在的“我”崩溃:“我”似乎在重新经历既往时,却又因当前化而使对既往的认同感发生异位。从而使“我”化为

虚无,也使作为叙述者“我”与作为体验者“我”之间的张力变得强烈:

我只要一想到那丛树便仿佛听见耳语声秘密的波浪涌来闻到了袒露的皮肉下热血在跳动的声音透过红彤彤的眼帘观看松了捆绑的一对对猪一面交配一面冲到大海里去于是他说我们必然保持清醒看着邪恶得逞其实它并不能永远于是我说它也没有必要占上风如此之久对一个有勇气的人来说于是他说你认为那是勇气吗于是我说是的父亲你不认为是吗于是? [2](181页)

“我”仿佛被集体记忆所窒息,无法将自己拖到阳光下来,以便让更广阔的表象世界担待我,结果,叙述中的“于是”就萎缩成简单的“和”,导致时间无法在空间中流动和延续,时间在这里变得含混不清、可有可无,或者说成为一种静止的存在。

在《喧哗与骚动》中,时间和空间不但是交叉的而且是一种重叠关系。在这一时空重叠的精神空间里,情感和精神是始终处于一种静态的、自我慰藉、意义建构与意义不断延异的状态。它构成了福克纳小说中人物现实存在的一种基本方式——人物不是生存于客观世界的复杂关系中,而是生活在先于我到来的过去和我不能左右、但却深深地钳制我的精神空间;在这一时空重叠的精神空间里,意义的建构过程在时间纬度上体现出明显的非线性化特征。作者是那样热衷和执著于人物心理结构的状态性描述,而这种描述又是局限在纯粹主观的、精神的层面,以至于导致物质时空跌落,其结果是人物既无欲望的表现、欲望的对象,也缺乏外在的动作用,缺乏物理时间的线性延展。在这样一种非动态的、缺乏变化的状态性空间纬度的叙写中,时间被消除了其现实性和物理性,被凝聚为一种静止的存在而与空间相重叠,对空间状态起到强化的作用。不难看出,这样一种时空结构对强化小说怪异、病态、异态的美感特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四 结语:死亡与寂灭

时间与空间的重叠,一方面可以赋予时间以空间事相,另一方面也可以赋予空间以时间厚度,这种厚度被赋予的同时,也使时间失去了其未来流向和在空间上的延展,诚如萨特所指出的:“福克纳的小说中从来不存在发展,没有如何来自未来的东西,他的‘现在’无缘无故地来到而‘中顿’(悬置)。”[7]

(149页)事实上,现在因无所往而“中顿”(包括未来与空间的延宕),现在也因记忆的无数碎片涌入而崩溃。这种“中顿”表面上是“现在”之无限延长,仿佛悬置在那里,其实是“现在”在空间上的跌落,而无法在空间事相或“空间表象”上揭示自身。而作品中过去与现在之二相性重叠则因现在之未来性缺席而缩减了“现在”处境中人物反思性介入既往的能量,结果是人物只有任由自己在无始无终的既往时间里游荡。这或许就是萨特所说的“过去的次序是心的次序”[4](55页),这种“心的次序”就是福克纳笔下人物的过去性。他们缺乏空间上的延展性和与时俱进性,因此“注定是贵族的最后一个婴儿有时可能是白痴”[5](31页)。萨特在谈到人的意识与时间关系时说道:

意识的性质包含着它被投入到未来中去的意义;我们只能通过它将变成什么来理解它是什么;它现在的存在是被自己的各种潜在性所决定的。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可能性的沉着的力量”。你不会在你自己身上找到福克纳式的人,他的人是一种去掉了潜在性,只以其过

去的存在来解释的人。[7](150页)

昆丁在时间中丧失了未来的维度,也就丧失了可能性的维度,他是“没有未来的存在物”(萨特语),这无疑解释了昆丁自杀的更深层的原因。这也决定了福克纳笔下的人物,比如昆丁,只有过去,他们生存在过去记忆的碎片中。而更坏的是他们的过去还不是按时序排列的,而是随着某种冲动和感情的逻辑而排列的。整个小说中的人物的记忆是混乱无序的,时间的次序也是混乱不堪的,同时人物的记忆只围绕着几个中心和焦点,如昆丁一直爱恋着的妹妹凯蒂的怀孕,昆丁的弟弟班吉的被阉割等都是这样中心和焦点,至少是昆丁剪不断、理还乱的无法释怀的情结。而要摆脱这一切最终只有死亡与寂灭。

人作为有时间性的存在不仅以肉体的形式存在于现在的物理世界之中,而且以意识、精神的形式超越现在。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拥有一个意义世界,一个诗意世界,因此,人在根本上是诗意地存在着。福克纳“给时间斩首,去掉了时间的未来——也就是自由选择,自由行动的那一面”,因此他的人物也就失去了这个本应诗意般的世界。

参考文献:

- [1]埃默里·埃利奥特主编. 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M]. 朱通伯等译. 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
- [2]福克纳. 骚动与喧哗[M]. 李万俊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 [3]转引自:李文俊. 福克纳评论集[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 [4]巴雷特. 非理性的人[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 [5]约瑟夫·弗兰克,等. 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M]. 秦林芳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 [6]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 [7]转引自:吴晓东. 福克纳的时间哲学[J]. 读书,2002,(3).

A Re-Understanding of Faulkner's Idea of Time Reflected in His *Sounds and Fury*

HE Ying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Sichuan 610054, China)

Abstract: William Faulkner brings forth his particular understanding of his time philosophy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The Sounds and Fury*. In every part of this novel is metaphorically embodied his idea of time. I hold that Faulkner's time philosophy is two-dimensional (past-present) other than commonly accepted three-dimensional (past-present-future);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time and space, time is represented by its temporal suspension and its temporal dropping-out; due to this suspension, the action of the characters is constantly delayed and lost in the past and is never extended into the future; therefore, consciousness fails to be reincarnated in spatial images.

Key words: Faulkner; *the Sound and Fury*; time; space; presence of temporal image

[责任编辑:张思武]

● 文史札记

伦敦桥在美国获得新生

刘达永

2005年2月12日下午4时20分,笔者抵达哈瓦苏湖市(Lake Havasu city)。这座位于亚利桑那沙漠(the Arizona desert)、人口约两万的小城,因有著名的英国古物(antique)伦敦桥(London Bridge)落户而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观光者,笔者便是其中之一。它的知名度并不亚于而今屡在电视里露面、建成于1894年的伦敦“塔桥”(the Tower Bridge)。

全长928英尺、宽69英尺的五孔拱型伦敦桥于1831年竣工。因限于当时的技术,大桥不堪现代交通工具的重压,在1962年被发现有下沉迹象,极有可能最终坠入泰晤士河。伦敦郡当局乃决定将其拍卖。1968年,祖籍英国的美国商人罗伯特·P·麦克考洛奇(R·P·McCulloch, 1911.5.11—1977.2.25.)以246万美元的高价将它购为己有。随后,他雇人完整地拆卸了这座大桥,每一石块仔细编号记载,以便按原样复建。接着装船运输,经大西洋入巴拿马运河至美国加州长滩港,行程一万英里。又在陆路运行300英里,终达哈瓦苏湖市。复建伦敦桥的地址,被选定在哈瓦苏湖东侧一半岛上。该湖是科罗拉多河上帕克大坝(Parker Dam)于1938年建成后形成的人工湖。工人们在半岛连结主要陆地处挖开出一条长一英里的水道,那半岛遂为一岛。新生的伦敦桥就卧跨在岛屿与陆地之间。在英国工程师罗伯特·巴雷斯福德(Robert Beresford)指导下,复建工程于1968年9月23日正式动工,1971年10月10日竣工。共花费近700万美元。麦氏去世后,其家人将私产伦敦桥及其配套建筑英式村庄一并捐献,当地政府将其辟为免费参观公园。今天,“伦敦桥活得挺好”(London Bridge: Alive and Well)

当初,麦氏宣布他要把具有140年历史的伦敦桥运至哈瓦苏湖时,人们都在讥笑他,视其为“疯子”(madman),而当大桥屹立在湖畔之际,再也没有人发出嘲笑声。人们在赞扬他,感谢他。麦氏是美国石油富商、链锯大王(chainsaw magnate),应是美国“先富起来”的人。1963年,他在亚利桑那州西部与加州交界处的科罗拉多河东边,购买了一块26平方英里的不毛荒漠,每英亩价格不足75美元。今日的哈瓦苏湖市就是在这块荒地上发展起来的。麦氏被誉为这座城市的奠基者。1964年麦氏在此开办了链锯制造厂(CMP),随后又举办其他事业。伦敦桥的复建,更为这里带来了商机,各色商人来了,旅游业随之兴旺发达。而今它是一座小而全、自食其力的城市,各种设施、行业、事业一如美国其它城市,它甚至还拥有一座小型机场。人们感觉不到它是置身于沙漠之中。生活在这里的居民都在“感谢麦氏和他的这座桥”(thanks to McCulloch and his bridge),称这座城市为“麦克考洛奇之乡”。

感谢意味着社会和谐。一座石桥的复活,竟带来如此大好商业利益和社会和谐,可能麦氏未曾料及。麦氏之此举,其直接意义是保护了文物,而且是异国古物。1968年的英国当局不至于缺少246万美元,英国的富翁们也不可能支付不出大桥的复建费。一个美国商人独具慧眼保护了古桥,使它免遭伦敦泰晤士河上始建于1176年的第一座石桥之厄运,这多少说明这位商人具有保护文物的历史意识。

时下一些国家的富翁捐助慈善事业,热心于兴办文教卫生等等公益事业,已不是个别现象。典型的如比尔·盖茨在2004年就为慈善事业献出了300多亿美元。富翁们这样做,肯定有助于社会和谐,至少可舒缓贫富之间的矛盾。如果我国“先富起来”的人士也在具有商业眼光的同时,花点钱保护文物、捐助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那肯定有益于和谐社会的形成或使社会更加和谐。